

走向媒体本体论

——向弗里德里希·A. 基特勒致敬*

陈 静

摘要: 弗里德里希·A. 基特勒是当代最重要的媒体理论家之一, 其思想呈现异常的复杂性。这一方面体现在其思想混杂了很多不同的思想来源; 另一方面则源于其思想在不同阶段有着新的发展。本文力图从三个发展阶段对基特勒的思想进行概括性的梳理, 以期使读者能够对其有大致的认识 and 了解。

关键词: 弗里德里希·A. 基特勒 媒介 话语网络 媒介唯物主义 媒介本体论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ists on Media Studies, Friedrich A. Kittler is alway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his theory lies in that on the one hand, it stemmed from different and complex theoretical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his theory has developed new branches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This paper will try to briefly sort out the inner thought of Kittler's theory and introduce the key ideas of every stage to readers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Kittler better.

Keywords: Friedrich A. Kittler, medium, discourse networks, medium materialism, ontology of media

毫无疑问, 弗里德里希·A. 基特勒 (Friedrich A. Kittler) 是继麦克卢

* 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学2011年度“晨星青年学者计划”(C类)资助项目。

汉之后最重要的媒体理论家之一。他是德国理论在新时期的重要代表,也在英语理论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在青年学者及学生中拥有极高的人气,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①事实上,就研究领域和兴趣而言,他比德里达更复杂,也更注重历史语境:他的研究和著作涉及媒体、历史、传播、技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古希腊哲学、数学和军事;他的思想被贴上了后结构主义、阐释学、反人本主义以及技术决定论等多种主义的标签,研究者们可以从中清晰地识别出香农(Claude Shannon)——维纳(Norbert Wiener)的信息论、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德里达的书写理论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体分析理论等众多理论浸染过后的痕迹;^②他以一种非典型的文学系教授的姿态,心安理得地居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裂隙之处,左手撰写学术论文讨论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英国著名摇滚乐队),右手又给学生讲授计算机编程,将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投入到《音乐与数学》的巨大工程之中。正是由于这种难以定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基特勒的思想在具有前沿创新性的同时,又得以跨越不同学科的边界。特别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其思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推动了文学理论涉足于技术领域之中,从而成为新媒体时代讨论媒介、技术、文学与书写等问题所无法逾越的理论基石。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基特勒思想的这种难以定义的复杂性也对阅读其著作的读者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在于理论的多样性,同时还在于他艰涩、深奥的写作风格。很难有人敢说,自己完全读懂了基特勒。但在进入基特勒的理论王国之后,

① 基特勒两部最重要著作的英文版均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英国著名的前沿文化与媒体研究杂志《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 Society*,该杂志隶属英国Trent大学理论、文化和社会研究中心,费瑟斯通任该中心主任)是他的英文论文的主要发表期刊,同时也发表了一批对他的理论进行评述的文章,作者大多为年轻学者;美国文学批评方面的最重要杂志之一,《新文学理论》(*New Literary History*)也发表过他的几篇重要论文和对其理论的评论;澳大利亚知名社会理论期刊《论题十一:批判理论与历史社会学》(*Thesis Eleven: Critical The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在2011年11月,基特勒去世后一个月出版了《论基特勒》的专刊,意在向澳大利亚的学者专门介绍基特勒的思想;美国新媒体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比如Lev Manovich, Mark Hansen, N. Katherine Hayles等都对其赞誉有加,并在思想方面受其影响。

② 有学者总结为“基特勒的理论是由美国式的对技术的关注、媒体理论的‘加拿大学派’以及输入德国学术语境的法国理论范式构成”。参见Claudia Breger, “Gods, German Scholars, and the Gift of Greece: Friedrich Kittler’s Philhellenic Fantasies,” *Theory Culture Society* 111, 23 (2006): 4; 另见Geoffrey Winthrop-Young “Krautrock, Heidegger, Bogeyman: Kittler in the anglosphere,” *Thesis Eleven* 107, 6 (2011): 8.

也很难有人说完全能够不受其思想的影响。

纵观基特勒的理论生涯，可以比较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在德国的阐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福柯的话语理论的影响下，对德国 1800 年代和 1900 年代这两个关键性年代的传播系统进行分析，代表作是《话语网络 1800/1900》。第二个阶段是从 1980 年代上半期开始，基特勒延续了上本书对福柯话语系统及文本档案的讨论，继而从福柯理论的局限性出发，关注到具体的媒介问题，特别是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书写的机械化）到最后的计算机对于文学书写的解构性意义。其“媒体话语理论”（Media Discourse Theory）更多地向拉康靠拢，强调了媒介及其技术的物质性对于文学书写和文本生成的决定性意义。第三个阶段尽管比较难以界定，但其特征是明显的，即在强调对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物质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回溯到古希腊，对字母、数字、音乐等符号系统及其哲学意义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其试图建构一条新的媒介本体论（ontology of media）的西方哲学思想路径的野心。^①与此同时，基特勒也有意识地与关注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英国文化研究，关注身份认同、性别和全球化的美国文化研究，抑或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加拿大学派有所区别。他试图从德国主流的阐释学话语氛围中，以美国的技术和法国的理论为养料，在德国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培养出独具一格的德国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

一 话语网络/书写系统的时代媒介性

《话语网络 1800/1900》（*Discourse 1800/1900*）德文版出版于 1980 年，5 年后重印，2003 年再版，1990 年被翻译成英文，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该书是基特勒诸多著作中在英语世界里最著名的一本，被誉为 1970 ~ 2000 年间，数字艺术领域中最重要 10 部书之一。^②出版之初，该书显现出来的，

① 关于基特勒理论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是由基特勒研究专家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基特勒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一书英文版的译者前言中提出的，他将其研究大致分为 1970 年代的话语分析、1980 年代电子媒体对话语的技术化和 1990 年代的数字化三个时期。

② 参见 Manovich, Lev, “Ten Key Texts on Digital Art: 1970 – 2000,” Reviewed work (s), *Leonardo*, Vol. 35, No. 5, Tenth Anniversary New York Digital Salon (2002): 569.

与文学系格格不入的另类气质让基特勒差点失去在弗赖堡大学文学系的教职,但在10年之后,这本书在世界上(不仅仅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得基特勒的理论广为流传。^①该书英译名使用了“话语”(discourse)这个词以对应德文书名中的“书写”(aufschreibesysteme),更加清晰地指出了基特勒与福柯思想关系中的联系与差异。^②

基特勒接受了福柯话语理论的内在逻辑,认为福柯的话语分析是通过对一个时代的话语系统进行重组以揭示那些被系统规则排除出去的东西。但他同时认为福柯的话语分析是基于字母存储和传输的垄断——这种旧的欧洲权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其理论的批判性止于1850年。基特勒由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话语系统”的概念,从话语的物质性出发,以香农—维纳的信息论模式为参照,^③凸显了技术与媒介在德国1800年代和1900年代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中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种重新认识两个时期的文学、哲学、社会的认识方式。这种认识方式也常被称为是技术中心主义的媒介历史考古学。

具体来说,福柯认为话语是由特定的文化决定的如何思维、如何演说条件下的陈述的综合,是根据一定规则系统生产话语对象的实践。由此,

① 参见 Griffin, Matthew, Susanne Herrmann, Friedrich A. Kittler, “Technologies of Writing: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 Kittler,”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7, No. 4, (Autumn, 1996): 731.

② 英文书名“Discourse Networks”(“话语网络”)与德文书名“Aufschreibesysteme”(“书写系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根据基特勒自己的解释,他采用的“Aufschreibesysteme”这个概念源自德国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的一本回忆录。通过使用“Aufschreibesysteme”这个概念,史瑞伯想要说明他在精神病院所做和所说的一切都被立即记录下来,无人可以避免。而这本书的英文书名翻译,则是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朋友们的选择,直接而鲜明地指出了该书毫无疑问受到福柯的影响。但对于基特勒而言,“话语系统”这个概念还可以看作对香农信息理论的一次活用。基特勒认为,福柯书写《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1970),只考虑到了话语的生产,而没有涉及话语的信源、传播通道和接收者。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香农信息模式(信息源、发送者、信道、接收者、信息宿)的影响。两个书名的指向差异性同时也恰恰表明了基特勒思想的一种漂移,其理论存在于具体的语境之中,同时又具有一种通约性,而基特勒本人也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在基特勒思想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指向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有意摇摆。

③ 基特勒相信“信息网络仅仅在他们相互冲突对照的时候才能被描述。也就是说,信息流的信源、发送者、信道、接收者、信息宿——香农的五个功能可以为不同的主体所占据,比如男人或女人、修辞学者或作者、哲学家或者精神分析学家、大学或技术学院等”。当对单个信息系统的解释已经固化或者稳定了的时候,两个系统之间的比较才可能出现变化。(Friedrich A. 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70)

其可能性受制于某种规则的排他机制。而陈述成立的条件之一就是“它必须具有某种物质存在”，“陈述总是通过某种物质的深度被给定的。陈述不仅需要这种物质性，而且一旦它所有的规定性被恰当地确定，它就不是作为补充被给予陈述的了。因此，从某一方面上讲，这种物质性构成了陈述”。^① 福柯承认了陈述的物质性对于陈述内在特征的决定性意义，即陈述的物质地位：某种实体、某种支撑、某个地点和日期会对陈述的同一性产生影响，通过语法、语义、逻辑，我们排除这种影响，识别陈述的普遍形式。^② 福柯虽然认为陈述也受制于不同的物质性规则，也就是使用与应用陈述的范围和可能性，在各个网络中，以其自身的结构（同一性）而被转换，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并不认为不同的媒介本身会对陈述的同一性产生影响。^③ 可以看到，在福柯这里，陈述的物质性更多的是一种结构、编码和限定条件，而陈述自身的同一性是被剥离在物质性之外的，本体意义上的完整性并没有被打破。

而这恰恰就是基特勒对福柯话语理论进行施用的起点。基特勒则打破了福柯对于陈述的同一性的保护，并明确指出，这种陈述的物质性就是媒介性，这种技术媒介性是意义生产的条件，同时也是决定意义生产的规则。因此，“话语/书写”本身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机制，其所构成的网络或系统也就指称了一种“技术和机制的网络，使得一种既定的文化可以去选择、存储和生产相应的数据”。^④ 基特勒进一步将香农—维纳的信息论模式与福柯的话语理论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理论模式：话语网络的过程中有着话语生产、传播、媒介、接收等各个环节，话语通过在不同环节的流动发挥着功用。由此，基特勒的话语及话语网络的理论及其施用不仅打破了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同一性，而且使得话语网络成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式，这就既不是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意义生产研究，也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

① [法]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09~110页。

② “因此，陈述的时间和地点，它使用的物质支撑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至少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福柯 《知识考古学》，第111页）那么陈述的普遍形式（同一性）何以可能在不同的物质性制度中被我们识别（被保持）呢？这是因为陈述的同一性是可以随着物质机构的复杂状况而改变。

③ 非常有意思的是，福柯在这里运用了信息论的一个说法——“一个确定的信息可以用另外的词、简化的句法，或约定的编码再次转化。如果消息的内容和使用的可能性相同，我们将能够说这里和那里是相同的陈述。”（福柯 《知识考古学》，第114页）。

④ Friedrich A. 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p. 369.

研究,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对信息媒介本身进行思考,将“技术”这个被福柯所忽略了的话语网络中的一环接上。

与此同时,基特勒接受了福柯有关认识断裂的思想,他偏好于认为时代的发展是有着阶段性断裂的,这种断裂往往是由于技术的伟大革新,抑或是战争。由此,基特勒分别对1800年代和1900年代两个时间阶段的话语网络进行了微观研究,并自觉融入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基特勒则以“学者共和国”(Republic of Scholars)大致对应福柯所说的“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在文艺复兴阶段,不存在任何的生产者或者消费者,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属于上帝的言辞;而从1800年代开始,基特勒观察到了一种转移的出现,从歌德式的“学者共和国”这个封闭的世界转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阅读和书写的世界,也就是福柯所说的“现代”。在前者中,知识借助于权威和博学,传播的模式依据的是社会分层的界限;后者则基于字母化的实践,涉及了从视觉语言到听觉语言的翻译,或者说文化的口语化。这种口语化的媒介则是母亲之口。^①正是母亲之口将孩子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母亲之口”重复了一种母性的力量,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他称为“教化言语的物质性”的转变,将母亲作为话语的信源,是古典诗歌产生的先决条件,同时,母亲也成了最早的他者。在此之后,真理成为母亲的同义词,母亲作为一种原初性的真理被保护和隔离起来。在此视角之下,基特勒指出,书写不过是源自阅读,而阅读源自倾听,那么所有的一切书写,也就是话语传播与流动也成了一种翻译。基特勒试图证明,由于1800年代的话语网络依赖于书写——这一处理和存储信息的单一、线性的通道,视力、声音和其他在传统语言范围之外的数据得以被记录,它们不得被挤压进字母的象征性瓶颈之中,也不得不为另一种意义方式所处理。与此同时,这种新的意义方式却不得不依赖于解释条件下的读者的眼睛和耳朵。当语言符号被转换成为声音和图像时,阅读成为了一种练习,由刻写术或者排版术所引起的口头幻象。而基特勒视野中的“1900年代”则指称了福柯最后所描述的、刚刚凸显出的“后现代主义”。他指出因为数据处理方法已经摧毁

^① 这是因为,在基特勒看来,1800年代的本质是女性(woman)。女性是母亲(mother),也是自然(nature),她实现了话语的生产(production of discourse),创造了最初的口头性(orality)。她将自身从上帝的言辞中解放了出来,字母化首先发生在母亲发音器官的训练上。同时由于母亲是孩子最初的教育者,所以孩子们学习字母并不是通过视觉的阅读,而是通过耳朵听母亲说话。

了字母储存和传输的霸权——这一旧欧洲的力量基础，所以福柯的知识分析研究必然地遇到了问题，无法在 1850 年代之后继续发挥其作用。那么，在 1900 年代，必须要考虑的一个要素就是技术媒体中数据的储存、传输和运算。^① 表音文字和电影，声音和图片被赋予了它们自己的、再适合不过的通道，导致了一种差异性的数据流，以及对古腾堡星丛的视觉摒弃。语言以往的霸权被分散到了媒体之中，特定化为众多媒介所处理的那种类型的信息。书写，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编码技术，已经被塑造光和声波的物理效果存储的新技术所颠覆。爱迪生的两大发明——留声机和活动电影放映机——打破了书写的垄断，开启了一种非线性（但也是序列性的）数据处理先河，建立了一种人类工程工业，并使得文学在生态环境的群落获得位置。

基特勒由此相信，话语（不同的文学文本）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之下，因为其媒介的改变，所以每个字在话语网络中的意义都是不同的，因此在高新技术时代条件下，将事物放置于某种话语秩序之中是非常困难的。^②

但是，话语网络并不止两种。事实上，正如基特勒自己所说，此书的写作是在材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书写的。在此之后，他还研究了古希腊学生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接受，认为还可以就此再写一本《话语网络》。

二 媒介唯物主义/信息—理论的唯物主义

正如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和武兹（Michael Wutz）这两位译者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一书的译者前言中提到的，基特勒特别拒绝任何对他的作品的特征化描述，比如“新历史主义或文学社会学”，而偏向于“频繁地求助于麦克卢汉的决定主义的媒体理论”这样的描述。^③ 更准确地说，基特勒在接受包括福柯、德里达和拉康等法国思想家理论的同时，还受到了以爱迪生为代表的美国科技文化的影响，从歌德走向了爱迪生，在媒介理论的发展脉络中建构了一个新的

① Friedrich A. 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p. 370.

② 1800 年代左右的普遍字母化和 1900 年代左右的技术数据存储都是这样的转折点，两个时代的根本差异会在其话语中体现出来。无论是教育法、诗歌还是哲学中循环的数据、地址、指令，抑或是在技术媒体、精神分析还是文学中循环的数据，差异性改变了每个字的数值。

③ Friedrich A.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XXXIV.

思想纬度,即对媒介自身理论思考。^①与此同时,这种自觉反思也是因为他所关注的问题在当代思想发展过程中已经愈加凸显——在新的媒介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理论家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即人类认知、交流与传播技术的关系问题。他们都意识到,在媒介变革的时代,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媒介和物质也在同时反过来塑造着人类自身,媒介与人类的生存境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如果说《话语网络1800/1900》是一种在书写与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媒介理论考察,那么基特勒在美国游学两年(1982~1983年)后,于1986年出版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则是更进一地转向了对媒介自身历史的考察。打个比方,正如俄国形式主义通过强调“文学性”来建立文学自律一样,基特勒也呼吁一种对“媒体性”(mediality)的研究,寻找媒体之所以为媒体的自律性、自治性和内在合法性。

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基特勒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媒体”观念。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是三个不同阶段的技术(留声术、电影放映术、打字^②)物质性媒介,同时也对应了三种特定时代的信息通道和三种书写的重构方式。

在基特勒看来,时间是一切的秘密。在过去,文本和刻痕是欧洲记录时间的唯一手段,这两者都基于书写,而这种书写的时间是象征性的。^③简单来说,基特勒认为:(1)书写是一种不存在的媒介,因为在福柯意义上的“档案”,也就是图书馆之前,书写只是传播的媒介,是被忽视的对象;(2)书写,或者说在1800年代之后是字母化垄断,仅仅记录了小部分发生过或者说过的事情;(3)书写只储存书写,其储存的是它被权威化的事实;(4)书写同时是电影和唱片,不光是媒介一技术上的实现,同时也发生在读者灵魂的形象中。

在打字机、电影和留声机出现后,基于字母化的与灵魂分离的书写垄断被打破了。新的媒体技术同时分离了光学、声学 and 书写的数字流,并宣告了它们的自治。尽管按照麦克卢汉的媒体借用理论,一个媒介的

① Griffin, Matthew, Susanne Herrmann, Friedrich A. Kittler. "Technologies of Writing: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 Kittler,"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7, No. 4, (Autumn, 1996): 734-745.

② 留声机与留声术、电影与电影放映术、打字机与打字在基特勒这里是不同的,分别代表物质性的载体和技术。

③ Friedrich A.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p. 4.

内容总是其他的媒介：电影和广播构成了电视的内容；录音和磁带构成了广播的内容；无声电影和磁性声音构成了电影的内容；文本、电话以及电报构成了邮政服务的半媒体垄断的内容。但基特勒认为不同媒介内容上的借用并不能改变在不同媒介中的数据流有所区别的事实，并且不同媒介上的书写与身体产生了各种联系。基特勒用拉康的理论来阐释这种联系。

与拉康在真实、想象和象征之间所做的区别相似且对应，基特勒指出书写在一种后印刷环境与象征性联系在一起，与语言符号联系在一起，这种语言符号已经被缩减成仅有的“物质性和技术性”，并且构成了一种“不考虑无限性的哲学梦想的无限集合”。^①相反地，想象与电影技术联系在一起，因为将单个镜头处理成一个投射的连续整体对应的是拉康的镜像阶段。在这个阶段，正如孩子对于他们不完美身体的经验的完美投射，是一种在镜子中的想象和意向性的构成。真实继而是对留声术的认同。留声术不考虑意义或者意图，而是记录所有身体产生的声音和所说的话，然后将词语的意指功能（1800年代话语网络中的主导想象）以及它们的物质性（与象征相一致的图形痕迹）从不可见和不可写的噪声中分离出来。真实“形成了浪费或者残留，这两者既不是想象的镜像，也不是象征的樊笼能够捕捉到的：生理的意外和身体偶尔不适”。^②

可以看出，基特勒在探索一种媒体性研究的过程中，将媒介的物质性与主体性身体联系起来。正如他在以尼采为例所说明的，尼采是最早使用打字机的哲学家，因此也是第一个完全意识到了理论和哲学沉思事实上是身体和媒介之间的交易效果体现的人，所以他指出，我们的书写工具也作用于我们的思想。基特勒还强调，在尼采晚年，尼采使用打字机进行书写，并且在《论道德谱系》中已经指出了，人性已经从它与生俱来的才能（例如知识、语言和各种动作）转移到了一种对记忆机器的爱好。

但基特勒比尼采走得更远。他的媒介唯物主义（或者说信息—理论的唯物主义）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更多的是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界定了人与媒介（机器、技术）的关系。他拒绝了笛

① Friedrich A.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p. 49.

② Friedrich A.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p. 49.

卡尔以来的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确定性，并在福柯的“人之已死”之后指出，“人类中心主义”投射下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基于特定媒介历史支柱之上的文化想象的虚构之物，“他”根本就没有开始过。直至海德格尔，西方哲学都将技术设定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产物，把包括计算机在内的技术发明视为人类的工具。而基特勒指出，意义并不是主体所赋予技术的，不是内在或者先于技术存在的，而是由技术所引导的，或者因为技术而变成可能的。^① 比如，从1880年左右这个转折点来看，光学、声学 and 书写之间的技术性差别打破了古腾堡的垄断，“人”的抽象统一的整体性被打破，人的听觉、视觉和触觉等身体感官从中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人”一方面成了胜利系统，另一方面成了信息技术。基特勒进一步指出，人们之所以将计算机——这一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技术发明——称为工具，是因为它们能像人类，存在于语言的基础之上，人们也能够自由地使用它，变得日常而方便，这就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地将这种技术媒介概念化为工具。主体与计算机之间是一种用户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被人们所忽略的计算机源代码的形式语言起到了扰乱使用它们的那些人的“理解和意图”的作用，机器和程序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反馈循环；与此同时，人也在对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被改变了，人的大脑处理融入了微处理器中，人的软件消失在计算机硬件中，作为一种认识和自我决定的能动者意义上的“人”将消失，从而被纳入技术的自动精密化的进程中。^② 由此，基特勒认为，该是建构新的媒介本体论的时候了。

三 硬件—古希腊：基特勒的后期研究

从1990年到2011年的20年间，基特勒的后期研究呈现出两极化发展的趋势。一方面，他对计算机，尤其是数字媒介的社会化与物质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图灵机的出现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从此哲学史被改

①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认为基特勒是追随了本雅明的脚步。本雅明观察到了每个历史的时期，某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只有通过一种技术标准的改变才能实现其全部的影响力。

② 基特勒对于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进行了辩证的批判，他认为麦克卢汉将媒体视为人的延伸依然是一种人中心主义的观点，并没有从媒介本身的角度去思考。

写；机器，特别是硬件的意义凸显了出来。^① 一般来说，人们在看到计算机（数字计算机）的时候，都会直接地与图像界面产生交互作用，从而认为软件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基特勒认为硬件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计算机可以运用自身的计算机语言进行运作，然后才是可程序化的语言，再接着是日常语言。人们因为硬件的不可见性和可程序化而忽略了硬件的作用，夸大了软件的效果。“一般而言对于运算能力和储存能力来说，硬件是不可替代的；但个别而言，每一种硬件又同样已经是可替代的。”^② 这种可替代性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起作用——“在技术层面上每一种硬件不言而喻只能用另一种硬件来取代，主要是由于计算机技术不可获取的储存功能是不可能作为单纯的软件来实现的。然而在逻辑的层面上，就材料的可程序化储存而言，每一种硬件恰恰都能够用软件替代。”^③ 基特勒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可程序化使得硬件成为一个未知的本质。这种可程序化遵循的逻辑是黑格尔式的精神对物质的胜利，^④ 其真身也是一种权力的结构。但是，随着计算机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和弦论的出现，使得计算机的发展也要考虑到多样性，而不是限定在单一的普遍轻便性和模仿性上。^⑤ 我们可以看到基特勒所称的“媒介唯物主义”其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硬件本体论。

另一方面，基特勒从媒介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对欧洲哲学史及理论中有关技术和媒体的讨论进行重新审视，并试图建构一种不同于英美文化研究的、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意义上的媒介本体论。^⑥

基特勒对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本体论的讨论进行了反思，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媒介”这个概念是否存在于本体论的讨论之中？（2）如果

① Gane, Nicholas and Stephen Sale,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Kittler and Mark Hanse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4 (2007): 323-325.

② (德) 弗雷德里希·基特勒《硬件，一个未知的本质》，载(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15页。

③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第115页。

④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第117页。

⑤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第121页。

⑥ Griffin, Matthew, Susanne Herrmann, Friedrich A. Kittler, "Technologies of Writing: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 Kittler,"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7, No. 4, (Autumn, 1996): 732.

没有,为什么?(3)从媒介的角度,本体论如何可能?

在《走向媒介本体论》这篇并不长的论文中,基特勒首先从两个缺失开始,即事物的媒介在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中的缺失和书写作为哲学自身的媒介在哲学史中的缺失。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和内容是本体论意义上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而在其间将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的(就像将融化的青铜通过艺术家塑造成为女神或者人体的雕塑)技术媒介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对立而被忽略了,“它们(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或共生隐蔽了其圆满实现中的所有距离、缺失和虚无”。^①因此,基特勒在这点上赞同海德格尔的说法,对本体论的讨论2500年以来都限于形而上学的范围内,而不是从过去与将来、存储与传播的角度来给予思考。不过,技术媒介并没有完全被亚里士多德忽略,而是被放在了感知的范围内探讨。心理或者生理上对事物的感知必须经过一定的中介,亚里士多德将原子论中的火、土、水、气四要素中的气和水说成是“居中”的,起到了一种媒介的作用。具体而言,人类的听觉基于人类的生理构造,像在耳膜与耳蜗之间那样,事物与耳膜之间亦必然有空气;同样,听觉的实现也依赖于事物和虹膜之间的空气和虹膜与视网膜之间水的存在。基特勒指出,正是“亚里士多德首次把一个普通的希腊前置词(metaxú)(即英语的between)变成了一个哲学的名词或哲学的概念:tòmetaxú(即媒介)在缺席与在场、远与近、存在与灵魂的‘中间’,存在着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种媒介关系(mediatic relation)”。^②由此,基特勒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亚里士多德时代,媒介关系并没有直接在形式—内容的本体论意义上被讨论过,而是潜在地存在于形式—内容的中间/对立关系中。但也正是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媒介第一次成为一个哲学意义上可被讨论的概念。^③基特勒接着追问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没有将媒介(关系)放入本体论范围内进行讨论?基特勒认为,尽管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了单音与字词(phone and grapheme)、声音与书写之间的差别,但是由于希腊文化从根本上没有对音

① (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胡兰菊译《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第251~253页。

② (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胡兰菊译《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第251页。

③ 基特勒认为,为此麦克卢汉本应该感谢亚里士多德这位最伟大的希腊语言创造者,而不是用讽刺和无意义的谴责淹没他,因为正是他预言了媒介,至少是自然的或物质的媒介存在。

与词，口语与其书面表达加以区分，所以亚里士多德尽管预见到了“媒介”的哲学意义，但是并没有突破其时代的局限。因此在哲学的历史上，尽管一次又一次涉及了“媒介”问题，但无论是在草纸卷上书写字母、以书卷方式阅读的古希腊圣贤，还是开始用羊皮卷并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督教神学家，抑或是用笔在白纸上写作、开始用现代代数表达思想的古腾堡哲学家笛卡尔，又或者是以口头一手抄一印刷方式在大学教学的费希特，他们都没有关注过哲学自身的媒介，更没有考虑到媒介对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基特勒指出，这个被忽略的问题只有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认识。在关于“时间与存在”的讨论中，海德格尔在毁灭形而上学的同时，将距离作为我们存在的本质提了出来。我们可以将基特勒在这里所说的距离理解成一种媒介所起到的关联性作用。“技术媒介已经取代了心理与生理媒介。在其终结或毁灭之时，本体论也就成了距离、传播和媒介的本体论。”^①而在计算机时代，基特勒指出，这种媒介本体论也就成了地址、指令和数据的三位一体，是在“硅固体物理学和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双重条件之下的媒介本体论”。^②

在2000年后的著作中，基特勒继续推动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媒体理论建构。一方面，他从硬件的角度反思文化机构与媒介，比如对大学作为一种硬件的探讨，对书籍与透视关系的探讨、对计算机图形界面的研究等；另一方面，他开始研究从媒介哲学意义上对书写历史的反思，比如古希腊的字母、数字与数的关系、数字与音乐等。可以说，基特勒自身的思想就像计算机技术本身的发展一样，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拓展的过程中。同时，这也构成了我们对其理论理解、反思和批判的难度。而其中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最难的部分是如何能够站在基特勒的视角，从技术和文化的两个维度对其理论的复杂性和意义加以理解。

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① (德)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走向媒介本体论》，胡兰菊译 《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第253页。

② (德)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走向媒介本体论》，胡兰菊译 《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第255页。